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汉学研究

第二集

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分类号 22.39083 K 207.8 - 53

著者号 Y085

登录号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32802

汉学研究

第二集

CHINESE STUDIES

阎纯德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考古所图书馆



Z0032802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学研究 第2集/阎纯德主编.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8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ISBN 7—80101—806—0

I. 汉… I. 阎… III. 汉学—研究—文集 IV
. K207. 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8314 号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电脑排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北京友谊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375

字数: 430 千 印数: 1100 册

定价: 25 元

为汉学研究题词

融会中西
贯通古今

张岱年



九七年八月

構架世界文化

友誼橋梁

敬賀

漢學研究
二集出版

任繼愈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 顾 问 任继愈 (Ren Jiyu)
张岱年 (Zhang Dainian)
季羨林 (Ji Xianlin)
杨庆华 (Yang Qinghua)
萧 乾 (Xiao Qian)
- 主 编 阎纯德 (Yan Chunde)
- 编 委 乐黛云 (Yue Daiyun)
安平秋 (An Pingqiu)
李明滨 (Li Mingbin)
严绍璿 (Yan Shaotang)
侯 健 (Hou Jian)
耿 昇 (Geng Sheng)
钱林森 (Qian Linsen)
黄卓越 (Huang Zhuoyue)
阎纯德 (Yan Chunde)
韩经太 (Han Jingtai)

卷前絮语

1996年,盛夏酷暑中,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成立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第一集《汉学研究》。那是《中国文化研究》和汉学研究所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上开出的第一朵瘦瘦的小花。花虽小虽瘦,但毕竟是学校和我们的心血与真诚浇灌的结果,是学界同仁集体智慧的结晶。

春风秋雨又一年,盛夏酷暑之后,我们又编辑出版了《汉学研究》第二集。这一集原本拟收文章50多篇,无奈限于篇幅,不得不将已经编校好的文章移至《汉学研究》第三集。这些文章是《20世纪汉学与21世纪文化》(阎纯德)、《从〈中国通史〉看18世纪“中国热”》(法国 米桓夫人)、《18世纪中国和法国的科学触撞》(法国 詹嘉玲)、《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第五部有关汉文化圈的宗教科学讲座》(法国 郭丽英)、《法国对突厥、回鹘和新疆的研究》(法国 路易·巴赞)、《略论儒学在越南的折射传播及展望》(越南 邓艳琼)、《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的生平和著作》(耿昇)、《一个巴黎女子在拉萨》(法国 阿兰希弗)、《卫匡国两部汉学著作评述》(吴孟雪)、《荣格心理学与佛教思想》(美国 W. R. 帕斯菲尔德)、《20世纪日本的明代研究概述》(李庆)、《美国的马可·波罗——小罗伯特沃恩的巨著》(美国 欧文奥尔德里奇)、《李约瑟与中国古代文献》(王玉德)、《朝鲜李朝的志怪小说》(王晓平)、《关于中国诗歌语言及其中国宇宙关系的几点看法》(法国 程继贤)及《略论汉语的兄称》(加拿大 陈三平)等。

一个人,躲在烈日下,或藏在风雪中,耐着寂寞,耕耘岁月,是一种幸福。做点儿实事,是我们的心愿。中国文化研究和汉学研究及其书系的编辑出版,是一项平凡而又伟大的事业。我们期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之手给予我们指点和关怀,好让我们的小花成长得更肥硕更实在更亲切。

《汉学研究》是一座刚刚搭起的桥,希望大家都走这座桥,好让它热闹起来,让它牢固和延伸起来……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编辑委员会

1997年8月11日

序

杨庆华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周易·系辞下》)。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的崛起，中外交流不断扩大，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应用价值、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重要。中国文化也越来越显示出其宽宏的包容性和国际性。因此，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中国文化研究蔚然成为一门全球性的“显学”。

中国文化研究，从广义上讲，应该包括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和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国外的，习称“汉学”，有的也称“中国学”。近十多年来，汉学，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有一千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汉学研究机构更是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创立，呈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可以说，当代汉学无论从外延上，还是从学科的内涵上，都足以证明一个历史新阶段的开始。当今的汉学，大概由三个板块组成：一是海外华侨华人汉学的成果；二是以日本、韩国为主的亚洲汉字文化圈汉学家的成就；三是欧美澳国家为主的汉学著述。从总体考察，三部分不同的成果，因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异文化参与的程度、角度有所不同，故而各具特点，但又有许多相通之处。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中外文化熔铸于一炉，都是两种或多种文化交融、化合的结晶。阎纯德教授曾有一段精采的概括：“从中国流出的文化，汲取了异国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种文化。”

汉学的兴盛,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在这千年的世纪之交,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在积极地探索人类社会的重大课题——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人文导向及其体系。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塑造,而且还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荣辱与兴衰。在这方面,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找不到完美的理想答案,于是渴望从中国文化里吸取智慧与知识。所以,近年来不少富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汉学论著相继问世。对此,我们应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新世纪的目光,积极地把海外有价值的汉学著述介绍给国内同仁,并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从而丰富我国的中华文化研究的宝库。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必要的学术工作,既不能短视,更不容小觑。“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杜甫·木皮岭》)。我深信,海外有不少汉学精品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或许,这正是《汉学研究》编者,作为当代汉学研究领域的拓荒队之一,四海觅文,不惜汗力,所要奋力追求的。

1997年盛暑

《汉学研究》第二集

目 录

题词	张岱年 任继愈
序	杨庆华
荷兰的汉学研究	熊文华 1
18 世纪法国耶稣会士与欧洲汉学	许光华 30
法国汉学的历史与现状	钱林森 齐红伟 53
天马和龙涎——12 世纪之前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化传播 [法国]布尔努瓦著 耿昇译	70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科技的调查 [法国]彼埃·于阿尔 明 翁著 岳 岩译	93
中国宗教之精神	[法国]葛兰言著 马利红译 钱林森校 120
法国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史的研究 [法国]童 丕 蓝克利 著 耿 昇译	128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党统治向共产党领导的过渡 [法国]白吉尔著 刘和平译	140
孟德斯鸠的中国文化观	钱林森 154
艾田蒲与中国文化	钱林森 170
荣格与汉传佛教	李以洪 180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文化资财的掠夺 ——日本中国学史上黑暗的一页	严绍璦 210
日本近代汉学中的史学研究	郑春苗 223

2 目 录

论韩国的儒学研究	陈 清	234
以色列的汉学	黄陵渝	244
莫斯科的孔夫子	李明滨	261
一代学术巨擘——记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	张西平	270
向往天堂的自我——鲍吾刚的中国幸福观	张东书	273
鲍吾刚著作要目	[德国]汉克杰	281
马悦然的汉学建树	张静河	295
东方是不是东方——赛珍珠在中国	吴海蔓	309
捷克汉学家	徐宗才	332
清代广东乡治组织与团练之渊源	[韩国]都重万	356
唐宋志怪与越南汉文志怪的文学成就	王晓平	374
清代小说反映的婚姻伦理	[韩国]朴永鍾	385
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在西方	周发祥	403
西方汉学界的文类学研究述要	周发祥	413
母题——钱钟书《管锥编》解读之一	[德国]莫芝宜佳著 马树德译	439
文学影响的倾向性和互补性	[美国]奚 密著 青 乔译	469
说唱词话和《三国志演义》刊本的演变	[澳大利亚]A·E·马兰安著 陈圣生摘译	480
英语世界《红楼梦》译本综述	帅雯霖	503
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翟理思著《中国文学史》	帅雯霖	510
悉尼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	黄鸣奋 [澳大利亚]毕熙燕	519
法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的图书馆	[法国]马古安著 岳 岩译	528
欧洲汉学动态 6 则	王 丽译	532

荷兰的汉学研究

熊文华

一、早期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

秦汉以后,中西交往的海上通途是从云南大理或永昌经缅甸、印度前往欧洲。15世纪末入侵阿拉伯地区的土耳其人阻断了东西方贸易的传统通道。1486—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Bartolomeu Dias)发现经非洲好望角可以前往东方,从此欧洲人便循此水路纷纷来到亚洲。荷兰濒临北海,航海业发达,16世纪下半叶摆脱西班牙统治后就积极加入了欧洲列强在亚洲的殖民地争夺,许多荷兰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华。荷兰知识界最初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汉语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荷兰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海员、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外交人员以及旅居海外的华人(特别是旅居东南亚和欧洲的华人)获得的。

一名在葡萄牙人手下做工的恩克赫伊曾(Enkhuyzen,荷兰小镇)青年瓦格赫纳尔(Waghenaer)曾经于1568年至1588年两度乘船到澳门。回国后他在《航海宝典》(Treasure of Navigation)一书中谈到了在那儿的所见所闻。他写道:“中国居民极好。该国盛产金子、宝石、各类丝绸、珍珠、珠母贝、樟脑、水银、大黄、麝香以及可想到的一切东西……”“该国居民生活水准极高。虽然他们喜欢吃狗肉甚于其他肉类,但是均可享用到各类食品。他们饮用大米酿制的烧酒直至酩酊大醉,可他们天性聪慧,善于制作各类灵巧的东西。”该书1592年在莱顿问世,是荷兰人直接报道中国社会情况的第一份珍贵史料。

1595年科内利斯·德·豪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率领荷

兰船队起程赴东南亚,航行3年后到达万丹,受到当地华商的友好接待。后来他回忆说:“中国人能干勤勉,从不赚省心钱。他们就像我国的犹太人。”他带回去了一些书。本世纪40年代曾在英国牛津发现一本《水浒传》的扉页,上面写着“史学教授默拉博士赠于莱顿的一册中文书”等字样,很可能就是豪特曼带回国的一本中国文学名著的扉页。默拉(Merula)是莱顿大学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

赫尔聂斯(Heurnius)是莱顿一位教授的儿子,虔诚的新教徒,1624年前往东印度群岛以前曾出版一本有关传教法的书。他在书中谈到传教应该使用当地的语言,并认为中国是已消失的十大部落的国度,应该向他们宣讲救世福音书。他还引用伊萨先知的话说:“看呀,他们来自远国近邦,来自北方西方,还来自中国人的故乡。”他在巴达维亚(荷兰殖民者曾把印尼雅加达改为此名)任职期间认识了一位懂得拉丁文的中国天主教徒,便跟他学习汉语。1628年11月2日他在给荷属东印度公司董事的信中写道:“在一位懂拉丁文的中国人的帮助下我们编写了一本字典,先列出荷兰文和拉丁文,然后注明汉字及其用法。同样我们还把信条经文、十戒和主祷经文译成了汉语,并附上了基督教要义。我们不厌其烦地去做此事,因为这样的中国人才实在难得。我们希望一旦展开了与中国的贸易,这本书对于子孙后代将极为有用。”该字典现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荷兰只保存了一个没有拉丁文翻译的副本。

这本字典流失之前,曾一度保存在任教于莱顿大学的东方学学者雅各布·戈利耶斯(Jacob Golius, 1596—1667)^①的私人图书馆中。戈氏旅居近东多年,1625年被聘为阿拉伯语教授,1629年又受聘于数学系。他和几位前任,如:约瑟夫·斯卡利杰尔(Josephus Scaliger, 1540—1609)以及萨尔马修斯(Salmاسius, 1588—1654)等人都对于中国人用天干地支纪年的方法以及其他各种历法很感兴趣。戈利耶斯在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弄清了中国流年图的许多模糊点。可以说他的工作从真正意义上开拓了荷兰莱顿大学的早期汉

学研究。他一生收藏中文图书共 19 部 80 卷。比较一下 1647 年以前巴黎皇家图书馆仅收藏中文书 4 册,就知道戈氏的中文藏书数量在当时算是相当多的了。

神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在被罗马教廷派往中国解释耶稣会士与中国典礼的冲突前曾为印制地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呆了几个月。戈利耶斯很想向他请教,但因为卫匡国忙于地图印刷的事,只是利用在莱顿换船的短暂时间帮他弄清了波斯的“契丹纪年系统”与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年系统原是一回事。一个是成吉思汗西征将士带去的历法,另一个是直接从中国传去的版本。戈利耶斯对于那次短暂的会见十分满意。1654 年他再次在比利时的安德卫普会见了卫匡国,询问并聆听了许多发生在中国的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回到莱顿后戈利耶斯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中国人对季节的划分及其名称,作为卫匡国地图册的附录。文中的木刻汉字是荷兰第一次印刷的汉字,也是欧洲第一次印得较好的汉字。

卫匡国的地图册出版时还附文叙述明朝为清所亡的史实。荷兰诗人冯德尔(Vondel)可能与卫匡国有过交往并从那篇史料中获得了灵感,因为他曾以明亡这一非同寻常的题材写过一个剧本,于 1667 年他 80 岁时发表。卫匡国曾在阿姆斯特丹长期逗留,他经常打交道的出版商布劳(Blaeu)正是冯德尔的旧友。

另一个关心中国事情的荷兰学者是戈利耶斯和萨尔马修斯的高足伊萨克·福修斯(Issac Vossius, 1618—1689)。他对中国的纪元系统也十分感兴趣,不过他想了解的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历史方面的问题。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们,崇尚并研究中华文明,想证明比欧洲更先进的文明国家是存在的,以此作为抵抗教会长期专制、建立新哲学体系的武器。福修斯就属于这样的批判主义者,他常以所报道的中国悠久历史来激起人们对圣经传统真实性的怀疑。查尔斯二世曾经说过:“这位满腹经纶的神学家,除了不相信圣经外对什么都置信不疑。”作为一个居无定所的学者,福修斯

曾一度为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收购过珍版图书和手稿。宫中常常拖欠他的薪俸,为了弥补经济收入的损失,有些书稿他便借而不还。虽然他一生中只收藏了一本中文书,却存放着大量传教士所写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早期出版物。

1660年福修斯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名为《论世界的真实年龄》的著作,提出了世界至少比通常测算的历史要长1400年的新观点。在该书的第11章开头他写道:中国人是世上最有学问的人。中国历史延续了4500年,他们的经典作家早于摩斯^②。他们与邻国不相往来,不知战争为何物,一切顺其自然,轻松快乐。他们如是度过了4000余载,不为外人所知,却自得其乐。然而就在400年前鞑靼人(蒙古人)打开了该国大门。马可·波罗等人有幸前往造访,回国后讲述了在那儿的一段美好经历。无人可对此事加以印证,因为能去者寥寥,去后愿返国者更是寥寥。“我认为,”他又写道,“他们不愿离开是因为有感于中国人的善良天性和那片天空下的仁慈与宽厚。与中国人共享过欢乐的人是难以忘怀那个国度和那儿的友人的。”他还说,即便像卫匡国这样一位在叙述中国人美德时表现得很有节制的人也曾对友人坦言:当他再次奉谕前往中华之邦时,故国于他已似流放之地,若日后不能老死中国,不如早日了此残生。的确,“怀念中华”和“东方的召唤”是当年侨居中国的西方人所熟悉的两句话。

伊萨克·福修斯还在另一部著作中谈到了中国的事情。他赞叹中国人口众多,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特别是在医药、植物学、药理学、建筑学、音乐、绘画、雕刻方面的成就以及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他认为中国人只是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逊色于西方基督徒。

荷兰法兰西教派一个名叫菲利普·马松(Phillippe Masson)的牧师曾得到赫尔曼斯编写的《荷汉字典》和基督教要旨以及其他一些手稿。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古老的民族,用汉语一定可以对希伯来语撰写的经典进行最恰当的解释,于是他便向乌得勒支大学一位叫雷兰(Reland)的知名的东方学教授请教。凭借那本《荷汉字

典》他大胆地进行希汉两种语言的比较。他的研究结果无不使世人震惊。例如他说以色列人在沙漠中所获得的神赐食物“吗哪”(manna)与汉语的“馒头”源出一词。他还对《创世纪》中的一段话“到达思罗(Shiloh)之前节杖和立法者都将与犹大同在,众人将拥聚在他身边”解释说,“希伯来语的‘思罗’与汉语的‘时乐’也是一个意思。可以用它来描述弥赛亚^③,也可以用它来解释《路加福音》中的‘看哪,吾赐汝福音,亦赐众生福音’。”马松在研究过程中曾与巴黎的国王图书馆馆长阿贝·比尼翁(Abbe Bignon)有过书信往来。当时该馆有一位叫阿卡狄鄂斯·洪(Arcadius Hoang)的中国人专门负责对传教士存放的中文书疑中的疑难进行解答。比尼翁曾让那位洪先生看过马松的文章,洪先生提出过若干条意见。马松的儿子长大后去伦敦维拉大街的法兰西教会当了牧师,把那本字典和一些手稿带到了那儿。可惜的是,那些遗物早已淹没在大英博物馆的故纸堆中,被世人遗忘了。

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议会赋予该公司在国外行使政权的职能。此后荷兰人先后占领了爪哇、苏门答腊和马六甲等地。他们大量招聘华人建设巴达维亚,以便发展制造业和商业,开拓与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1619年留居巴城的华人人数大约为350人,10年以后增至2000多人,1720年巴城一带的华人激增至10万人。荷兰当局对当地华人社会的管理使他们感到有必要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语言进行了解,为此曾经作出了种种努力,荷兰史书对此多有记载。至今仍有大量印尼华人社区早期行政档案、族谱和契约华工的文契保存在莱顿大学图书馆中。

1604年荷兰提督韦麻郎(Wijblard Van Waerwijek)率战船攻占我国澎湖,1624年入侵台湾,逐步扩大在那儿的势力范围。至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达38年之久。据台之初,在2800荷兰移民中有600多人为官吏、商人和传教士。他们依靠汉人,采用政教合一方式,设立学校,划分教区,教授荷文,传经布道,发展农业。《巴达维亚城日记》对于那段历史曾有所记录。

1655年荷政府派巴达维亚商人杯突高啖(郭佑, Pieter de Goyer)和惹诺皆色(Jacob de Keyzer)携重礼作为特使晋见清帝,寻求建立友好关系和直接贸易。清廷准荷使节每八年乘四艘商船来华。使团从荷属东印度群岛经广州至北京,一路所见均由随员约翰·尼乌霍夫(Johan Nieuhoff)记录成文。该文当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表以后,很快就被译成了法文、德文、英文和拉丁文,在欧洲广为流传,被视为一份有关中国的重要文献。1665年荷政府再次派以财政部长兼驻东印度枢密谘议范和伦(Pieter van Hoorn)为团长的使团从福州前往北京,行三跪九叩礼晋见清帝康熙。达珀(O. Dapper)将此行详情写成了一本书,问世不久也被译成德文和英文,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荷政府派出以帕茨(Paats)和惹诺皆色为正副团长的第3个使团于1686年抵京,可惜使团的旅行日志始终未能出版。

阿姆斯特丹市长尼古拉斯·维特森(Nicholas Witsen)曾经读过并引用过荷兰第3赴华使团的旅行日志。他早年就学于莱顿大学,受到戈利耶斯较大的影响,后来成为一位俄国事务专家和彼得大帝的密友。在他所撰写的《东部和北部的鞑靼人》一书中曾谈及许多中国北方的情况。他与许多能提供第一手中国情况的人有过通信联系,例如佛兰芒赴京传教团就是其中的一些人。他也编辑过其他使团的见闻录。1692—1694年俄国沙皇曾派遣使团从陆路去北京,该使团的报告记录了许多外国人未曾去过的亚洲地区的珍贵资料,就是经他的手编辑出版的。

根据不同时期中荷两国的贸易关系和政治形势,荷兰政府每隔一二十年就派使团赴北京寻求建立外交关系扩大中荷贸易,每次都以后发表一本旅行日志为其最大收获。1794年荷兰政府又派出特使德胜(Issac Titsingh)和范罢览(Van Braam Houckgeest)赴华,于翌年抵京,觐见清帝乾隆。德胜是荷兰人在日本定居点的一个厂主,也是日本通。范罢览曾在荷属东印度公司从事对华贸易多年,1774年退休后闲居荷兰乡间。1783年携妻子女7人移居美国,在南卡